



# 圆 明 园

北京的西北郊，泉水充沛、湖泊罗布，有玉泉山、香山诸名胜，远处的西山峰峦连绵如屏障。绿水青山，一派江南情调的美景。历史上闻名中外的圆明园（包括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就座落在这里。

公元十一世纪，辽、金的统治者已在玉泉、香山一带修建行宫作为避暑游憩之所。元代，海淀镇以北的低平原上，由万泉庄泉水向北渲泄汇聚成的一片池沼地区，就以风景佳丽而成为京师近郊的游览胜地。骚人墨客多有诗文吟赞，给予它以“丹稜泚”的雅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占地造园。到了明末，丹稜泚附近已经是西北郊私家园林荟萃之区了。其中名重一时的，有以恬淡雅致著称的“勺园”和誉为“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

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初，来自关外的满族统治者很不习惯于北京的炎夏气候，曾有择地另建避暑宫城的拟议。当时，南方尚在用兵，政府财力不足，尚没有力量进行新的营建。待到康熙中叶，三藩叛乱平定，全国统一。明末以来的大动乱之后出现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经济有所发展，政府财力也比较充裕。于是，康熙帝玄烨立即在北京西北郊着手经营皇家园林。先后建成香山行宫和玉泉山静明园。接着，又利用明代清华园废址的十分之七（约九百余亩）兴建畅春园，

作为他自己“避喧听政”长期居住的地方。畅春园大约完工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它不同于一般的行宫园苑，在园林的前部建置一个包括“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已略近于“避暑宫城”的性质。这是清代的第一座特殊形制的皇家园林——离宫型皇家园林。

畅春园建成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玄烨均在此居住、处理政务。这里遂成为北京大内以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附近又陆续有许多皇室和官僚的“赐园”建成，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皇家园林的特区。雍正以后，皇帝园居相沿而成惯例。他们在每年新正郊礼完毕，就移居西北郊的园苑，到冬至大祀的前夕才返回大内皇宫。一年之中，园居时间约三分之二，大内仅仅作为举行大典的地方。从康熙到咸丰的六代皇帝，死在大内的仅乾隆一人。正因为这种园居的风尚，所以清代西北郊的园苑之胜，远远超过元、明两代。

## 圆明园的初建

圆明园在畅春园北面，早先是明代的一座私家园林，其具体内容已无从考查。清初曾将西北郊的许多前明私园收归内务府奉宸院，再由皇帝赐给皇室成员和贵族官僚，叫做“赐园”。圆明园就是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赐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座赐园。所以，圆明园的建园历史，应该从这一年算起。

作为赐园的圆明园比起后来的规模要小得多。园内“林皋清淑，波淀滢泓”（胤禛《圆明园记》）是一座水景园。据文献记载，园内有一处“牡丹台”，殿宇精致，殿前的台

地上栽植着成百株的牡丹花。康熙六十一年，胤禛曾携皇孙弘历进谒玄烨于此处，后来改名“镂月开云”，位于后湖的东南角。当时西北郊的赐园大抵都尽量利用充沛的水源而以一个水面为主体，周围环以河道。按照皇家的规制，赐园的规模绝不能超过皇帝居住的畅春园。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断康熙时的圆明园的具体位置大致是以后湖和前湖为中心的面积约为五百亩左右的一块略近方形的地段。园门设在南面，与前湖、后湖恰好是一条中轴线上，成比较规整的布局。

## 圆明园的扩建

玄烨死后，皇四子胤禛继帝位。1725年（雍正三年），以畅春园奉皇太后居住，改赐园圆明园为离宫型皇家园林，因而大加扩建。扩建的内容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中轴线往南延伸，在原赐园的南面“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亲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胤禛《圆明园记》）。此即宫廷区的“外朝”，共三进院落。第一进为大宫门，门前有宽阔的广场，广场前面建置影壁一座，南临扇面湖。大宫门的两侧分列东西外朝房，即政府各部门的值房。第二进为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有金水河绕门前成偃月形，河上跨汉白玉石桥三座。门两侧分列东西内朝房，即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处以及缮书房、清茶房、军机处值房。第三进为正殿“正大光明殿”，是皇帝上朝听政的地方，宴请外藩、寿诞受贺也在此举行。正殿东侧是“勤政亲贤殿”，皇帝在这里批阅奏章、召见群

臣、处理日常政务。西侧为翻书房和茶膳房。

正大光明殿直北、前湖北岸的“九洲清宴”一组大建筑群以及环列于东西两面的若干建筑群是帝后嫔妃居住的地方，相当于宫廷区的“内寝”。

第二部分就原赐园的北、东、西三面往外拓展，利用多泉的沼泽地改造为河渠串缀着许多小型水体的水网地带。

第三部分，开凿东半部的福海及其周围的河道。

第四部分是沿北宫墙的一条狭长地带。从地形和理水的情况看来，扩建的时期，可能更晚一些。

扩建后的圆明园，面积达三千余亩，仍然保持着水景园的特点。水面大中小相结合，大水面“福海”开朗舒展，中型水面“后湖”尺度亲切，其余众多的小型水面则为水景近观的小品。回环萦流的河道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水面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不仅是水上游览的通路，也是后勤供应的交通线。聚土而成的岗阜、岛堤和叠石而成的假山散布于园内，与河湖水系相结合，构成一系列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自然空间，宛似天然奇观美景的缩影。建筑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据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的记载，乾隆时期命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中，有二十八处曾经胤禛题署过，它们散布在上述四部分的地段范围内。这就是说，雍正时期的圆明园，至少已经有二十八处重要的建筑群组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澹泊宁静、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鱼跃鸢飞、西峰秀色、四宜书屋、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夹镜鸣

琴、廓然大公、洞天深处。

## 圆明园的盛期

乾隆朝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最后阶段，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帝弘历作为这个“盛世”的君王，附庸风雅、喜好冶游。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弘历《静宜园记》），对于园林艺术也颇有一些见解。凡重要的园林建设都亲自过问，某些规划设计甚至直接参与其事。他的宫廷里有“如意馆”的画师可充园林设计的咨询，有雷氏家族主持的“样式房”作为设计机构。挟持皇室剥削得来的富厚财力，集中全国的良工巧匠，以空前的规模修造园苑供一己享用。弘历曾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视，遍游江南的名园胜景。凡是他所中意的，即命随行的画师摹绘下来，作为北方建园的参考。终其一生，在他所经营的皇家园林里面再现江南风致和园林之美，始终是不遗余力、不计工本。所以这时的北京西北郊园林，在康熙以来百余年所积累的造园设计和施工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得以更广泛地吸收江南造园艺术的精华，从而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弘历沿雍正旧例，扩建畅春园奉皇太后居住，仍以圆明园作为自己居住的离宫，对该园又进行第二次扩建。这次扩建并没有再拓展圆明园本身的地盘，而是在原来的范围内，按原规划的格局充实旧有建筑、增加新的建筑，调整旧有景观、增加新的景观。“四十景”中的十二处就是乾隆时增建的，它们是：麋院荷风、坐石临流、北远山村、映水兰香、

水木明瑟、鸿慈永祜、月地云居、山高水长、澡身浴德、别有洞天、涵虚朗鉴、方壶胜境。并在东邻和东南邻另建规模稍小的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

圆明园的扩建大约在1744年（乾隆九年）告一段落。

长春园于1749年动工，两年后建成，距圆明园扩建的大体完工只有五六年的时间。据《日下旧闻考》所载，长春园内的“澹怀堂”、“含经堂”的兴建还要早于1749年。从时间上来判断，修建长春园并不完全如弘历所说“予有夙愿，若至乾隆六十年寿登八十五，彼时亦应归政，故邻圆明园之东予修此园，为他日幽游之地”（弘历《御制诗序》），而实际上是作为圆明园扩建的一部分。弘历“归政”以后也并未住此而是住在大内的宁寿宫。

长春园是以一个大水面为主体，利用岛、堤的穿插将水面划分为若干不同形状、有聚有散的水域。建筑布置得比较疏朗，在地形处理、山水布局、水面尺度等方面比圆明园更趋成熟。从遗址现状看来，这座园林在北方诸园中可以算是上品之作。园北面的狭长地带内，有一组欧式的宫苑，俗称“西洋楼”。包括六幢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式的建筑、若干“水法”即喷泉、欧式庭院及园林小品。这是弘历命当时以画师的身份供职如意馆的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蒋友仁、王致诚、意大利人郎世宁等人主持设计建造的。虽全是欧式风格，但建筑的细部雕饰大量采用中国纹样，喷泉、水池都避免使用西方传统的裸体雕像而代之以鸟兽虫鱼，以适应于中国人的鉴赏趣味。

西洋楼自成一区，目的显然在于不影响长春园的格局，也可能有“夷夏之别”的用意。这一组特殊的建筑虽出

于弘历的猎奇心理，就圆明三园的总体规划而言，也不过是局部的点缀。但这是中国宫苑里面首次出现的成片的欧式建筑，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亦不失为一段佳话。

绮春园大约于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由几个小园林合并建成，其中包括皇室成员死后缴进的赐园。这是一座小园林集锦而成的水景园。

圆明、长春、绮春三园之间有门相通，平面像一个倒写的品字形。三园同属圆明园总管大臣管辖，后两者是前者的附园。因此，一般通称的圆明园也包括长春、绮春二园在内，又叫做圆明三园。

1750年（乾隆十五年），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基址建成清漪园。这时候，北京西北郊已经有了五座大型的皇家园林：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号称“三山五园”。圆明园是其中最大的一座。附近的小型赐园也陆续增加到近二十座之多。海淀以北的低平原上，极目所见皆为馆阁联属、绿树掩映的名园胜苑，形成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宏大的皇家园林区。

乾隆以后，圆明三园的园工仍未停顿，修缮和增建工程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

嘉庆初年，圆明园内的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永日堂等处进行了一次大修缮，并在北部修建“省耕别墅”。但园工的重点则集中在绮春园。1809年（嘉庆十四年），建成大宫门，并修葺“敷春堂”“清夏斋”“澄心堂”等处殿宇。接着，又把庄敬和硕公主的赐园“含晖园”和西爽村成亲王寓园等并入绮春园的西路并大事修葺，绮春园的规模比乾隆时扩大了将近一倍。



乾、嘉之际，可以说是圆明三园的极盛时期。这座全部于平地起造的大型园林，总面积达五千二百余亩，人工开凿的水面占一半以上，人工堆叠的岗阜岛堤总计约三百处。建筑物估计约十五万平方米，相当于故宫建筑面积的总和。这些建筑物具有多种的形式，以满足帝王宫廷和园居生活的需要、多方面乐趣的追求。除宫殿、居住和一般的园林建筑之外，还有佛寺、道观、祖庙、骑射场、大戏楼、藏书楼、陈列馆、码头、船埠，乃至市肆街道、山居水乡、农家村舍、西洋楼等。

建筑物个体的造型一般都小巧玲珑、千姿百态。举凡殿、堂、楼、阁、轩、榭、馆、斋、舫、台、塔、亭、廊等，应有尽有。而且能突破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于北方和江南的民间建筑，创造出许多特殊的平面形式。三园之内，水网密布，故各式桥梁的形象极其丰富多样，水面游船的样式也有近十种之多，它们都成了园景的重要点缀。

建筑物的绝大多数都集中为许多群组、分散在全园之内。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群的形式互不雷同、布局极尽其变化之能事，可说是把我国传统建筑的院落组合的多变性发挥到了极致。它们或倚山、或临水、或在平地、或居水中，分别与那些自然空间的局部地貌和树木花卉的配置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系列丰富多采、性格各异的园林景观，即所谓“景”。或大或小的景一般都以建筑作为主体，是建筑美与自然美融揉而创作的具有典型性格的园林景观，是园林规划的基本单元，而园林总体则可说是诸景的集锦。这样的“景”，在圆明园有近一百处，长春园与绮春园各有三十余处，合计约一百六十处。每处都有命名，其中重要的如“圆

明园四十景”、“绮春园三十景”则由皇帝加以诗文的题韵。

这一百余处的“景”，其造景的形式多样、取材广泛。除了一般地再现江南山水风致之美以外，有缩移摹写某些江南名景的，有取法前人诗画意境的，有摹拟古代神话中的神仙境界的，有自成一个园林的格局即所谓“园中之园”的。例如：福海沿岸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等之仿杭州西湖十景，“西峰秀色”之仿匡庐奇秀；“坐石临流”之仿绍兴兰亭，“坦坦荡荡”之仿杭州玉泉观鱼，“夹镜鸣琴”一景取李白“两水夹明镜”诗意，“武陵春色”摹仿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意趣，“蓬岛瑶台”之仿李思训仙山楼阁画意，“方壶胜境”之取材于神话传说。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小园林，或者连缀成集群，或者另星地散置园内，形成了大园之中包括着许多小园林即“园中有园”的规划特点。这些小园之中如圆明园内的安澜园、长春园内的小有天园、狮子林、如园甚至分别以当时江南的四大名园即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苏州的狮子林、南京的瞻园作为创作的蓝本。

如果说，追求享受园林之乐趣是封建帝王奢侈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的话，那么，他们所占有的劳动人民的创造以作为一己享用的园林必然在规划设计上体现他们的意图和爱恶，造园思想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很明显的。这从圆明三园大小百余“景”的设计特点、模拟对象和命名来考查，可以看出其所包含着的十分驳杂的内容：有象征皇权尊严的宫廷区，有模拟“禹贡九州”而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后湖九岛，有取材于佛经的“珞迦胜景”“舍卫城”，有象征道家传说中的东海仙山的福海三岛，有标榜儒家孝行的“鸿慈永祐”，有寓意四海承平的“九洲清

晏”“万方安和”，有显示帝王重农耕的“多稼如云”，有赞扬儒家哲人君子、隐逸出世的“濂溪乐处”“廓然大公”，有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源阁”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充分表现封建帝王“万物皆备于我”的腐朽意识，也可以说，这是儒、道、释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在园林艺术上的集中反映。

圆明三园的殿宇内，陈设考究，装修精美，还收藏着难以数计的大量古籍、文玩字画、珍宝和各种工艺品。它不仅是一座名园，也是一座综合的艺术宝库。它展示了我国封建文化的精萃，也体现着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的结晶。

通过耶苏会传教士致教廷信函中的详尽描写，圆明园还被介绍到欧洲而蜚声一时。在当时的欧洲园林界，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无异于一个全新的造园概念、一个全新的美学观。对于十八世纪欧洲风景式园林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嘉庆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已经由盛而衰，皇室再没有财力营建新园了。道光初年，畅春园逐渐圯废，皇太后移居绮春园。为了节省开支而扞去静宜、静明、清漪三园的陈设，但作为皇帝离宫的圆明园，园工仍不断进行。每年的岁修费用，约在十万两之多，而规模较大的新建和翻修工程如奉三无私殿、九洲清宴殿、慎德堂、明春门、观澜堂等处的花销尚不计在内。

## 圆明园的被毁

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

义势力用武力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锁国的门户，我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咸丰帝奕訢继位后，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建都天京，继而进行西征和北伐，前锋一度进逼天津。清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奕訢仍在圆明园内大兴土木，继续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英国籍口“亚罗船事件”，派遣侵略军进攻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咸丰八年）6月，清政府被迫签定天津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6月，英、法两国又籍口护送公使赴北京换约，以军舰进攻大沽口炮台，被大沽守军击退。事后，这两个殖民主义国家又纠集二万多兵力卷土重来，乘清政府遵照天津条约撤防北塘之机，攻陷大沽口，沿白河长驱直入，占领河西务。清军一触即溃，京师大为惊震，奕訢仓惶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清政府派载垣去通州议和，由于英法方面所提条件过于苛刻，和谈破裂，载垣当场逮捕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英法联军闻知此事，遂自通州直趋北京西北郊，以清帝居住的圆明园作为进攻目标。

10月6日傍晚，法军先到，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死，当晚法军就开始抢劫。7日，英军紧跟着到来，两军统帅在园内巡视一遍以后的第一件事是举行分赃的谈判。决定“协派英法委员共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若者归英军、若者归法军”（柯底尔：《1860年对中国之远征》）。

但是，到了第二天，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们再也不能耐心、也不甘心于等待上级的分配。“他们不再能抵抗物品

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似乎暂时疯狂了一般，身心都沉浸在一件事业里，即是抢劫掳掠”（俄耳斯莱：《1860年中国战争之简述》）。法国军官赫理逊于目击抢劫的现场后，也不得不写下抢劫者的贪婪丑态：“有互撞而相争者、有将扑或已扑者、有扑而复起者，有矢誓、有谩骂者、有大声嘶喊者……。犹之蚁穴为足所蹴，群蚁各衔米粒虫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泰晤士报》记者于11月7日自北京发回的一则通讯中说：“据估计，被劫掠的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银有珠玉的時計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抢劫得来的大量赃物，有的在现场拍卖，有的被带出国外，有的则由侵略军作为礼品献给英国国王和法国皇帝。至今英、法博物馆内收藏的中国文物中，有许多就是掠自圆明园的。

为了掩盖劫掠的罪行，英国特使额尔金提出“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而且还找到一个似乎冠冕堂皇的理由：“圆明园乃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毁坏这个地方，对于他的骄傲和情态两方面，准定是个大打击，决没有错。由塞克骑兵的口述看来，他将我们可怜的国人（指巴夏礼等人）带到此地，使他们在邻近的地方，经历种种苛刑……。军队将要开向那地，并不为着抢劫，不过用一种严厉的报复举动，表明为清政府所犯的这桩大的罪恶激动起来的我们的惊惧和愤怒”（司温侯：《1860年华北战役的经过》）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其实，侵略者之决定焚毁圆明园，绝不仅仅为着上述的目的。而有着更为深远的用意，即对当时尚不完全就范的“天朝皇帝”施加一种切肤的压力。对此，沙俄公使普提亚京曾一语道破：“除非使北京本身受到压力，否则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也办不成的”。

这个行动立即得到英国政府和报界的支持。经过一番策划之后，额尔金下达了焚毁圆明园的命令。英军第一师师长米凯尔中将率所部骑兵奉命执行任务。放火的临时指挥所就设在正大光明殿。

10月18日清晨，火焰升起，一次破坏人类文明的罪恶行动开始了。

英军翻译官司温侯记下了现场目睹的情况：“不久，浓烟直冒，渐渐冲向天空，表明这件工作已经开始。当白天慢慢过去，烟雾逐渐加大，并且越来越浓密，飘飘荡荡，仿佛一片大的云彩罩盖北京，并且又象一个可怕的大风雨将要来临。当我们走进行宫的时候，火声劈劈拍拍，很是使人惊震。并且穿过一重重的烟雾，太阳照耀中天，使一切花草树木都带了一种憔悴的病色。殷红的光焰，映在从事放火的军队们的面庞上，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恶魔一样。虽是毁坏他们所不能恢复的东西，却洋洋自得的，觉得很是光荣。这天夜晚，陡觉温暖，并且当着一个个屋顶倾塌下来，喷出大大的一卷一卷的浓烟。我们想，对于一个老大帝国的命运，这是表示一种愁惨的预兆。”

（司温侯：《1860年华北战役的经过》）

大火一直延烧到10月19日，主要焚烧对象是圆明三园，但“王大臣园寓及宫门外东首各衙门朝房及海淀居民铺户，

大半焚烧”（恭亲王奕訢奏折）。

数日后，米凯尔的骑兵继续放火烧香山、玉泉山、万寿山、畅春园等处殿宇。

当北京西北郊的宫苑正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像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1861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我们欧洲人自称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什么……。在历史的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定评。

一代名园胜苑，数日之间付之一炬。这时候清王朝朝廷上下乱作一团，奕訢一再指示当时负责办理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訢“只可委曲求全，以期保全大局”。10月24、25两日，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英法联军始退出北京。

1861年（咸丰十一年）7月，奕訢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同治帝载淳嗣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从此，开始了我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广大人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残酷压迫下，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圆明三园经过这次焚毁，毕竟园子的范围太大，据当时

内务府的调查报告，圆明、长春北半部一带尚有不少建筑和山池花木完整地保存下来，各园仍由有关的官员和官监管理着。

1873年（同治十二年），两宫撤帘，载淳亲政。是年八月，载淳以奉养两宫太后为名，下令修复圆明三园，并按道光时之旧例以绮春园为太后的寝宫改名为“万春园”。命内务府样式房作出修复方案的全部图纸和烫样（模型）、销算房作出全部的工料予算。清除现场渣土，作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修复工程开始不久，由于国库空虚、地方政府“报効”不力、建筑材料奇缺，加之统治阶级内部意见分歧，以至园工无法进行下去，不得不于次年停工。

停工后，内务府派员详查各殿宇完工情况并造具清册，对未完工的建筑物则妥为保护，各园管理事务的官员仍然行使其职责。可见清王朝对圆明园的修复，并未死心。

1874年，载淳病死，光绪帝载湫继皇位，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1881年（光绪7年）东太后钮祜禄氏病死，西太后那拉氏独揽朝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攻占北京城，西太后与载湫逃往西安。当时，北京城内外秩序混乱，驻守西北郊的八旗兵丁勾结官监和附近的地痞恶霸，将圆明三园内的木构殿宇几乎全部拆卸、盗卖一空，林木亦砍伐殆尽。经过此番洗劫，原来幸存下来和同治年间重修的建筑物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了。

1904年（光绪三十年），以经费支绌，裁撤圆明园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到了宣统年间，圆明三园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园内已是“麦陇相望，如行田野之中”（谭延闿《圆



明园附记》)。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官僚、帝国主义分子更是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地挖掘、盗运残存的建筑遗迹，甚至难于搬动的石料亦成块成件地运走。至今在北京的许多地方仍能看到圆明园的华表、石狮、铜兽、石柱、太湖石、石雕等大件的遗物。而小规模地偷盗残材，更是成群结伙，逐年不绝，有的人甚至以此作为专门职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有关部门才将遗址保护起来，并纳入全市的公园规划用地之内。1976年设立圆明园管理处，清理了园内的西洋楼等几处建筑遗址，并修筑了部分道路、桥涵，进行了绿化，举办了展览。党和政府、学术界以及广大群众对圆明园的前途都十分关心。这些，预示着圆明园的新的发展阶段行将到来。

如果说，圆明园在过去的兴衰反映了我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么，我们衷心地期望它今后的新生也将从一个侧面体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页。

周维权